

感。在探討身體與鐘點時間時，關於近代中國時間的演變對身體的塑造作用，作者着墨似嫌不夠。筆者以為在研究中將趨勢化研究與微觀分析適度結合，對於該書的完美應該有所幫助。

再者，本書將研究時限定為1895-1937年，尚有許多對近代中國身體的形成有重要影響的歷史實踐，作者或一筆帶過，或沒有涉及。如近代軍事化對身體的影響，南京國民政府發起的新生活運動，以及中國蘇維埃政權內的身體狀況等。作者也承認「就中國身體在二十世紀的發展而言，它除了經歷

我在《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一書中所探討的國家化、法權化、時間化、和空間化的變化外，事實上還有許多面向是值得我們再去細部思考的」(黃金麟：〈身體與政體：研究二十世紀中國身體的一些線索〉，[www.ncu.edu.tw/~eng/csa/journal/journal\\_park20.htm](http://www.ncu.edu.tw/~eng/csa/journal/journal_park20.htm))。作者也在後續的研究中開始關注民國時期蘇維埃政體對身體發展的影響。

總之，黃金麟的這部《歷史、身體、國家》是值得一讀的有關近代中國身體史的力作，期待着他的下一部身體史著作的問世。

## 評介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研究

### ● 趙鼎新



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香港：開放雜誌出版社，2004）。

王友琴在《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下稱《受難者》）中所記載的歷史我並不陌生。文革開始時才十三歲的我未能真正參加那場紅衛兵運動，但是我看到了同班同學放火燒了兩位女老師的頭髮，見過一群身穿軍裝的紅衛兵揮動着銅頭皮帶毆打一

王友琴在《文革受難者》中記載的歷史我並不陌生。我常常思索紅衛兵的那種野蠻、殘暴和瘋狂何以會在中國發生。為此讀了不少有關文革的書籍，但是沒有一本像《受難者》那樣深深打動了我。此書以傳記形式記載了659名文革死難者的經歷。659人僅是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員的滄海一粟，但它本身卻又是一個很大的數目。

位已在地上縮成一團的男子，也見過躺成一排的在武鬥中身亡的屍屍。文革初期自殺成風，我從大字報和標語中得知《受難者》中記載的一些名人（像大學領導人常溪萍和作家聞捷）的死亡；我經常聽見鄰里們下班回來帶着恐懼的表情向我們述說某處有人跳樓了，哪兒有人開煤氣自殺了；我甚至親眼目睹了一位剛從樓上跳下尚未死亡的女子，她腦漿迸出，渾身抽搐，兩眼茫然地望着那逐漸增多的圍觀者……。我當時並不真正懂得政治，這一切在當時給我帶來的只是恐懼。成年以後，特別是在對文革有所認識之後，我常常思索文革時紅衛兵的那種野蠻、殘暴和瘋狂何以會在中國發生。為此，我閱讀了不少有關文革的書籍，但是沒有一本像《受難者》那樣深深打動了我。

《受難者》以傳記形式記載了659名文革死難者的經歷，其中包括一些當時的社會上層人士，但主要是普通教師和學生、工人等等，此外還有數十位連名字都沒留下的左奶奶、馬大娘、學校炊事員等。為了此書的研究，王友琴四處採訪，小心求證，到處託人，時有碰壁，頂住了各方壓力（當然也在眾多人的幫助下），歷時數十載終於完成了這一巨大工程。659人僅是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員的滄海一粟，但它本身卻又是一個很大的數目。我們在書中看到了紅衛兵在打人之餘高叫他的皮帶「吃葷不吃素」（頁38），在將人打死後騎着摩托車在死屍上碾來碾去（頁39），把沸水向綁着挨打的老人身上澆去（頁508）。

我們看到了有人為能承受紅衛兵毒打，甚至跪在家裏叫兒子模仿紅衛兵打她以進行「彩排」（頁261），許多人因捱不過毒打和各種迫害而被迫自殺。我們看到了北京大興縣在1966年8月的六天裏竟然有325人被打死（頁80-82），北京航空學院在一場「清隊運動」中就整死了20多人（頁146）。中共在文革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又進一步推動和加劇了整個迫害局面（例如，頁123-34）。在書中，我們還看到了打人和迫害並不是最早興起的「老紅衛兵」的專利，而是文革的一個總體現象。後起的造反派紅衛兵如「北航紅旗」，一旦得勢後在整人致死方面並不遜色於那些老紅衛兵（頁145-49）。如此，《受難者》一書把659人的死亡傳記放在一起，向我們全方位地展示了文革的性質和人性的殘忍，這一點是任何理論分析和個案性的回憶錄都不能比擬的。

我曾對這樣一本以姓名拼音字母排列的傳記的可讀性有過懷疑，但在閱讀《受難者》的過程中我的這種念頭徹底打消了。《受難者》收入的許多條目長達數千至一萬多字，有些條目（如卞仲耘、顧文選、劉澍華等）甚至長達兩三萬字。這些條目本身就是一篇篇獨立成體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中，王友琴用她功力極深卻又淺顯流暢的文筆向我們生動地介紹了死者生前的作為和個性，從而把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栩栩如生地展示在我們眼前，通過嚴謹的考據向我們講清楚了整個迫害致死的前因後果，並以大量有系統的資料和分析，把一個個特殊事件與文革的大環境乃至中共掌權以後

的整個歷史聯繫了起來。《受難者》中的長文用了相當篇幅向我們介紹了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文革前的其他政治運動。因此本書所展現的不僅僅是一段文革史，而是整個毛澤東時代中國政治的縮影，具很高的史料價值。

《受難者》用了相當筆墨來描述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一些顯要人物在文革前歷次政治運動中的表現。比如，在翦伯贊的條目下我們見到了翦在1951年的「忠誠老實運動」時要他人「交代歷史問題」那種居高臨下的氣勢和文革時他被迫害致死的對比；在江隆基（1957年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和顧文選（北京大學一年級學生）的條目中，我們看到了江隆基在顧文選被打成右派時所起的作用和江、顧二人在文革中的不同場合被迫害致死的故事；在舒舍予（老舍）的條目下，《受難者》在描述了其死前遭到野蠻的暴力「鬥爭」後，詳細摘錄1951年老舍在《人民文學》中寫的一篇讚揚北京「控訴惡霸」大會上群眾打人行動的文章；在吳晗的條目中，《受難者》在記錄其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同時，沒有忘記提及吳晗在文革前特別是反右運動中所扮演的打手角色。正如王友琴在書中多次聲明的，她這樣做並不是故意要貶低那些被迫害致死的歷史人物。她這樣做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為我們講一個極其重要的道理：當一個人乃至一個民族為了一種（哪怕是純真的）理念而不顧他人的生命和基本尊嚴時，那麼這個人乃至整個民族均將為之付出沉重的代價。

貫穿着《受難者》的另外一個主題是對中國政府在文革結束後對文革的評價和善後處理所採取的「宜粗不宜細，水落石不出」政策的批評。我本人對中國政府的這一政策是持理解態度的。就我的立場和感情而言，我當然認為文革應當予以徹底否定，但是身為社會學家，我重視社會結構的力量。我知道，文革後中共如採取「水落石出」的做法來處理文革的話，中共政體可能會馬上垮台，而在毛澤東時代長期培養起來的政治文化（包括「造反精神」以及不容異己和民粹主義的精神）卻會揮之不去。因此，中共政體垮台後的權力真空絕不會是由一個以自由為基礎的程序民主政體來填補，文革式的政治在這樣的環境下只會發揚光大。從今天看，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宜粗不宜細，水落石不出」的政策為中國贏得了政治穩定，使中國在開放中逐漸遠離文革所給予我們的政治文化和其他陰影，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有效的政策。但是，這政策同時帶有很大的負面效應。正因為文革未被徹底否定，許多像在《受難者》中所記載的死難者因此得不到徹底的昭雪，在文革中犯下重大罪行的人沒有受到真正的法律制裁。更有之，目前的中國政府為鞏固其政權，已從早期的「水落石不出」地處理文革問題轉化為避免甚至壓制文革研究，文革的歷史和教訓正在離我們遠去。這種情況更顯示出了王友琴的工作的重要性。她不但在為文革死難者呼喚公正，不但在挽救歷史，而且我們可以說，中共的「水落石不出」政策是否能給中國帶來持續的正面作

《受難者》用了相當筆墨來描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一些顯要人物在文革前歷次政治運動中的表現。比如，在記錄吳晗被迫害致死的同時，不忘提及他在文革前特別是反右運動中扮演的打手角色。作者這樣做並不是要貶低這些人物，而是要指出：當一個人乃至一個民族為了一種理念而不顧他人的生命和基本尊嚴時，那麼這個人乃至整個民族均將為之付出沉重的代價。

文革離我們不遠，但文革的歷史已經不斷地在被重新塑造。例如，我們看到了一些造反派紅衛兵刻意把自己在文革中所做的一些十分畸形並對中國以後實行程序民主十分有害的言論和行為，塑造為中國民主思想和運動的先聲。王友琴的《受難者》將使我們永遠牢記文革僅僅是在畸形政治環境下的邪惡人性的大舞台。

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仰仗像《受難者》這樣的工作所帶來的平衡效應。不同聲音被完全壓制後，政治肯定只會走向專制，而歷史錯誤一旦被遺忘就有可能被重犯。

在讀此書的過程中，我十分欣賞王友琴那種是非分明、仗義執言的文風。例如，胡克實(頁11)和陸定一(頁370)雖然在文革中和文革前整過人，但他們因在文革後公開對被迫害者家屬表示了歉意而得到了正面的評價。一些小人物，像北京第八中學的張良銀和周國正老師在紅衛兵打人時能出面加以制止(頁151)，對於這種在當時很難得的行為，王友琴做了熱情洋溢的評論。還有，在李潔的條目下，王友琴寫了北大附中紅衛兵負責人彭小蒙怎麼把一個初一女生從女廁所裏拉出來，讓男紅衛兵用銅皮帶抽打她，但是彭卻在文革後發表文章大談自己如何受到迫害，而隻字不提她在文革中是怎麼殘害他人的。在同一所中學裏一位名叫關秋蘭的退休老師，卻僅僅是因為沒有為關在同一勞改隊的李潔(後被打死)說話，而在幾十年後在與作者交談時仍然表達了出自內心深處的歉疚。這樣的對比十分有力地表達了作者對前者行為的抨擊和後者情操的褒揚。在書中王友琴經常能把這樣的發生在同一單位的、相似的或關聯的事情非常自然地組織在一起，足見她研究的細緻和深度。

《受難者》多次以點名和不點名的方式抨擊像彭小蒙這樣的人物在當年和今天的行徑。這些人今天大多數還活着，有些甚至還地位顯赫。作為文革的參與者，這些人雖

然並不對文革持肯定態度，但是由於不能徹底正視自己在文革中所扮演的某些角色，他們常常在自己的文章和回憶錄中按自己的觀點和利益，對文革歷史進行着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塑造。王友琴在書中針鋒相對地抨擊了這些當年的紅衛兵，她這樣做是會得罪很多人的，因此需要有很大勇氣。但我想，王友琴與這些人士素昧平生、無冤無仇，除了正義感之外，她所想的僅是把文革更完整地展示在我們面前。我希望那些當年參加過迫害行動的紅衛兵在看了本書後，不但不要記恨王友琴，反而得到省悟和昇華。

的確，文革離我們不遠，但文革的歷史已經不斷地在被重新塑造。我們看到了有人想通過對林彪、吳法憲等人在文革中的某些具體行為史實的修正來為他們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翻案；我們看到了許多紅衛兵在強調自己受迫害的同時，迴避他們自己直接或間接地迫害他人的行徑；我們看到了一些造反派紅衛兵刻意把自己在文革中所做的一些十分畸形並對中國以後實行程序民主十分有害的言論和行為，塑造為中國民主思想和運動的先聲；我們還看到了一些西方知識份子，為了尋找對資本主義和現代化的批判武器，從不同角度把文革描述為人類歷史上一場有意義的試驗。我並不認為這種對文革史的塑造活動會停止，但是我相信王友琴的《受難者》將會成為文革研究中的中流砥柱，使我們大家永遠牢記文革僅僅是在畸形政治環境下的邪惡人性的大舞台。我感謝王友琴，我希望中國也感謝王友琴。